

# 風水輪流轉

## 兩度出使菲律賓賓記

(四)

● 劉達人(前駐菲律賓代表, 駐希臘代表)

### 大選人數經費估計

我在菲國任職的最後一年, 即民國八十一年(一九九二)年體驗到該國的總統大選和地方選舉。當年五月十一日, 全國各省市舉行投票大選, 等待選出的公職人員約有一萬七千三百個職位, 而參加競選的候選人約七萬人。菲律賓不愧是一個實施民主、民眾對政治興趣濃厚的自由國家。

此項大選不僅要選出總統、副總統兩位全國最高元首, 還要選出國會議員二百十四席、眾議員二百席, 各省省長七十五席, 而各省、市、村、鎮的議員、官員竟有一萬七千多席位等待選出。以上各項選舉是在同一時間進行, 故每一位投票人須帶小抄填寫四十五個候選人的名字, 實在是相當的困難和費時。菲律賓雖只是一個

中型國家, 但它的選舉規模則十分驚人。

根據當時對選舉所作的一些統計數字

敘述如下: 全國投票人口有三千二百萬人, 投票箱有二百四十萬個, 投票監督人有

五萬人以上; 至於花費方面, 政府費用是

非幣十億披索(美金一元折合非幣二十五

披索, 總計為美金四千萬元), 候選人競

選總開支是非幣二百億披索, 其中每一位

總統候選人之競選開支為非幣十億至四十

億披索, 參議員候選人為非幣二千萬至一

億披索, 眾議員候選人則為非幣五百萬至

二千萬披索。

最初, 總統選舉登記候選人有七十八位, 經審查合格且實力聲望較強者有八人,

到了該年四月間, 真正參選者有五人,

到最後衝刺者則只剩二、三人。在正式參

選的五位, 有一位聖地牙哥夫人(Miriam

D. Santiago), 她以清廉、不用金錢競選

為號召, 其競選費用不易估計, 至於其他

四位候選人, 根據報紙之刊載估計, 他們

所用掉的競選費用如下:

1. 羅慕斯將軍 (Fidel v. Ramos) 十

五億披索以上

2. 米特拉眾議長 (Ramon v. Mitra, Jr.)

二十億披索以上

3. 許實哥大使 (Eduardo "Danding" Cojuangco) 三十億至四十億披索

4. 伊斯特拉達參議員 (Joseph E. Estrada)

八億至九億披索

伊斯特拉達參議員為菲國知名影帝,

以演好人英雄著稱, 無人不曉, 他靠知名度來爭取選票, 不需花費大量金錢作為宣傳, 故競選費用較少。(伊斯特拉達一九

九八年當選為新任總統)。

九八年當選為新任總統)。

菲律賓境內有三千二百萬選民，每位總統候選人須動員近一百萬人去各地方活動，以爭取選票，其費用實在浩大。此外，報紙、電視、無線電、電影、民意調查等則熱鬧了數個月，而天主教、工會、民間社團、大企業、地方政治家庭、銀行，以迄外國人均多少介入此次大選中，甚至於我國內人士亦就其私人友誼趕來菲京助選，出力頗多。每位候選人彼此各不相讓，互顯神通。至於當地菲籍僑商更是大力投入選戰中，出錢出力，立場鮮明。由於我國僑商遍布在菲國各省市，許多候選人都以他們為募款對象，故有不少人乃以出國為逃避方法。

投票結果，羅慕斯將軍以其過去政績卓著，且領導人民力量革命成功，高票當選為總統；影帝伊斯特拉達參議員當選為副總統，兩人並不屬於同一黨，他們均係以個人聲望選上的。

新總統、副總統於民國八十一年七月一日就職，我國派遣總統府資政辜振甫、高玉樹及黃世惠、吳幼林等位率團前往馬尼拉觀禮祝賀，當時我已調往希臘，於六月十七日離菲赴任，故未能一睹菲國總統、副總統就職大典盛況。

### 美軍基地被迫撤出

菲律賓位居西太平洋的重要戰略地位

，惟因國防力量薄弱，當時的三軍總兵力約為十七萬人，另有保安軍約四萬二千人及一百五十連步兵；國防預算每年約僅十億美元，故裝備不佳，戰鬥力弱。美國為了確保西太平洋區的安全與和平，於民國三十六（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與菲國政府簽署了「美菲軍事援助協定」，為期九十九年，協定中訂定美方可使用菲國的二十三處軍事基地。同年三月二十一日雙方簽署了「美菲軍事基地協定」，根據此項協定，美國取得蘇比克灣（Subic Bay）與克拉克（Clark Base）兩大基地的使用權利，以每五年為一期，每期付九億美元租金。美國對這兩大基地所投入的設備、運作費用非常龐大，是為美國在海外的最大海空軍基地，每年的開支在五千萬美元以上。兩基地共雇用菲籍員工達四十萬多人，對菲國經濟不無小補。民國四十年六月一日，美菲再度簽署「美菲安全條約」。民國四十八年美菲同意將租期減為二十五年，每隔五年會商一次，以決定是否繼續租用。馬可仕總統在位時曾揚言，將於未

來的談判中，把租金提高五倍，亦即每期租金達四十五億美元，他視此基地為「搖錢樹」。

蘇比克灣與克拉克兩個基地均位於呂宋島西南部，控制著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海空航道，美軍在韓戰、越戰時即利用這兩個基地來運送、補給油料；它又正好位於日本至波斯灣的中途，一九八〇年代冷戰時期，更利用它來監視蘇聯在越南金蘭灣的海軍活動。

蘇比克灣海軍基地總面積為二萬五千公頃，其中陸地約一萬五千公頃、海灣一萬公頃。其深水港可停泊海軍艦艇九十艘、航空母艦戰機五百五十架，為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母港兼主要修護基地，平時美軍駐防在該地有七千名官兵，另雇用菲國員工二萬八千人。

克拉克空軍基地距馬尼拉市區約一百公里，面積為四千四百公頃。早於民國七（一九一八）年，美國已將此荒蕪地帶開闢為機場，並逐漸加以擴大，其主要跑道長一萬零五百呎（三千二百公尺），每天平均可起降四百架次飛機，與中、日、韓、星、馬各國之防禦有密切關係，是為美國在東南亞空防系統之重鎮。冷戰時期，

該基地為美國空軍在東南亞最大之空軍基地，係美國第十三航空隊的空運、補給、通訊、醫療中心地區。第十三航空隊建立於民國三十二年，有「原始森林空軍部隊」之稱，據稱它維護了一百種不同語言人口的防衛安全，範圍含水陸面積達一千八百一十三萬五千平方公里。克拉克空軍基地駐有美軍九千人，菲籍員工約一萬七千人，鄰近基地的安吉勒斯市 (Angeles) 因此而繁榮。民國六十九年，當地選出一位左傾市長施華茲 (E. Syaez)，他曾大肆抨擊美軍在該市製造罪惡，致使當時的美軍司令官下令禁止官兵外出基地，結果該市形同死城，此位左傾市長不得不要求美軍司令官取消禁令。此外，美國在菲境尚有二處較小的基地，為華萊斯空軍站 (Wallace Air Station)、碧瑤約翰海軍營區 (Camp John Hay) 及聖米格海軍通訊站 (San Miguel Naval Communications Station)。

(四) 記實律非使出度兩  
其主要是作為通訊、軍眷及休閒之用；為了使用這三個基地，從民國七十五(一九八六)年開始，美國加付給菲國軍援五千四百萬美元，經濟援助一億二千萬美元。美國在菲境的海空軍基地，對菲國的國防安全以及增進國民就業、繁榮附近城市

，關係重大。但自從民國七十五(一九八六)年菲國人民革命成功後，其民族主義高漲，且於左派政客之煽動下，常有大規模的示威遊行，要求美軍撤除駐菲基地、美軍回家去等等。民國七十九年，雙方開始進行談判，當時反對聲浪迭起，國會參議院亦開始辯論，反對之聲逐日加強；美國方面雖透過各種遊說活動，布希總統且願意提高每年租金到二億三百萬美元，但柯拉蓉總統及其內閣鑑於民意高漲，又見於經濟實益而搖擺不定，進退兩難。到了民國八十年十月，經過參議院之激烈辯論，民眾示威之後，乃議決廢止美菲軍事基地協定，要求美軍撤退，且規定是年即開始行動，不准延期。美軍在此基地已有九十四年歷史，對菲國不斷的索求，美方亦不勝其苦。

### 我國投資蘇比克灣

記得民國八十一年三月五日，我赴立

法院外交委員會報告菲國政情及中菲關係時，有一位委員曾詢問：「我國對菲國的經濟合作、援助，究竟可做多少？前途如何？」我答以：「目前國內的企業界可在菲國宿霧、納卯、甲維地 (Cavite)、拉

古那 (Laguna) 等地的工業加工區，參與他們的開發工作。」當時我亦曾提及菲方正準備收回美國在蘇比克灣之基地，我方可考慮投入，建議採用開放合作方式。報界對於菲國的蘇比克灣名詞較為熟悉，第二天報上在報導此事件時，標題竟寫為「劉代表建議開發菲蘇比克灣為工業區」。此舉在當時尚屬空中樓閣，未料過了一、兩年後，果然成真。民國八十二年八月六日，我國與菲國簽訂開發蘇比克灣工業區三百公頃之協定，我國際經濟合作開發基金 (ECDF) 為此分期貸與菲國二千三百五十七萬美元，作為開發基金。民國八十四年七月，已先完成規劃了一百零五公頃之工業地，且臺灣工廠如宏碁電腦 (ACER)、東帝士等已大量移入菲國，目前計畫將會有三十到四十家臺灣工廠到此地投資，我國在菲律賓之直接投資總額將躍居第三位，僅次於美國、日本之後，且較西歐、澳、紐、星、馬、香港為多。

美軍在菲國的兩個基地，可利用於工商業用途的面積超過新加坡一國的面積；且美國在該兩地所遺留的基礎設施 (Infra-structure)，總價近一百二十億美元。蘇比克灣區現已成立蘇比克灣行政區政府 (Su-

bic Bay Metropolitan Authority)，該區主

席由鄰城俄倫蓋堡市 (Olongapo) 的年輕

區現已有三億八千萬美元之投資。

市長高登 (Richard Gordon) 擔任，他是位多彩多姿、聲譽甚隆的人物。俄市市長遺缺則由高登夫人凱蒂 (Kate Gordon) 繼任，夫妻兩人合作無間，共同開發大蘇比克灣區。民國八十四年八月，美國聯邦快遞公司 (Federal Express) 選定蘇比克灣區，投資一億美元；美國安隆 (Enron) 電力公司亦投資了一億二千萬美元；投入此區的外資總共已達五億七千萬美元。至於菲國本地企業之遷入者，目前已有八十八家，投資額為二億五千萬美元。民國八十四年的出口貿易達一億二千萬美元，較之八十三年度的二千萬美元，成長速度甚快。該區已漸漸成為亞太空運中心。

美軍於民國八十年關閉菲國此兩大基地，遣散四萬五千名菲籍員工，鄰近的城市因而蕭條，百業俱廢，前途茫茫，菲政府更損失了鉅大租金。不過，菲方自力更生，於民國八十四年建立了工商業加工區，因而峰迴路轉，日趨繁盛，二十一世紀之前途將更不可限量。此正應驗了我國古諺「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目前國際間有南沙、西沙群島之歸屬問題，以及領域之糾紛，美方有意進入此海域，以防止戰爭之發生。事實上，菲國政府可以提出菲美商業性協定，使美國艦隊可以付費停泊在蘇比克灣，並可在菲國加油及維護，彼此一舉兩得，互助互利；此亦非五年前所能想到的，真可謂世事滄桑，難於預料。

### 加入亞銀三角談判

蘇比克灣區的土地租金，每一平方公尺每年美金十二元，克拉克區則只有六美元，若就地價而言，我國實難與之競爭。

駐菲律賓的國際組織不多，除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分署、國際稻米研究中心

(Clark Development Corp.)，由退伍將領

(IRRI) 等外，與我國關係較密切、重要的為亞洲開發銀行 (Asia Development

伊斯勒塔 (Teroso Isleta) 擔任主席。當地十分注意休閒設施，開設有大量的免稅商店及 Casino 賭場，並擬興建第三個機場跑道，使其成為菲律賓最大的國際機場。該

Bank 一簡稱 ADB)，我國為其會員國。亞銀創立於民國五十五年，我國為創始會員國之一。會員國除亞洲國家外，並包括

美、英、加、德、法等，共有十六個國家。以我國國籍服務於亞銀各部門者，過去曾有謝森中、莫家慶等諸位。我駐菲期間，劉顯榮、柯海生、邱炳雲等七位，他們分別職掌發展政策、財務撥款、水利灌溉、自來水、民間企業等部門業務。亞銀總裁自創立即由日本籍財金界人士擔任，執行秘書則為印度籍亞德卡 (Arun Adhkar)

他為人很爽快，堅守國際文官立場，以感情用事，我們與之打交道尚稱愉快。當時我國已有代表權問題，亞銀與中共、亞銀與我國，三方經過三年冗長的談判，民國七十七年我方勉予同意以中華臺北 (Taipei, China) 名義參加年會，惟每次年會俱由我國理事提出抗議，爭取改善，大會主席每回均表示知悉，而亞銀總裁先是藤岡，後為若水，他們則表示了解我國立場。我國雖參加年會，但不意謂我國接受此 Taipei, China 之名稱。

第二十三屆的亞銀年會於民國七十八年五月在北京舉行，我國代表團因簽證的技術問題，大陸方面要我方持臺胞證入境，但不為我方接受，由於臺灣與大陸在不接觸之態度下，乃不得不透過亞銀秘書處

從中斡旋，間接辦理外交。每當我政府有所指示時，即由我及李光億組長到亞銀舊大樓，先上六樓找執行秘書亞德卡，申述我方立場及意見，再由他到五樓找中共駐行理事孔繁農，由他向北京徵詢意見。在三不政策下，雙方不能直接談判此一技術性問題，必須經過第三者，如亞銀秘書處之轉達，使得原本進行緩慢的簽證簽發過程，更顯得遲緩。不過也由於亞銀執行秘書之居間，此「三角談判」氣氛因之緩和多了，雙方不致發生對峙僵局。

(四) 兩度出使菲律賓實記

當時我代表團爲了赴大陸參加亞銀年會，必須辦理簽證事，故我與李光億組長去亞銀的次數很頻繁，經常樓上、樓下跑，耗費時間；由於我方係由韓國代表我國股權，故在此無辦公室，只好到任職亞銀的我國籍人士的房間歇腳。時洪啓川博士擔任亞銀財務主任，他的辦公室與執行秘書處相距不遠，我們乃成爲他的常客。我代表團的入境證全交由亞銀執行秘書亞德卡來處理、保管，他不僅代我方辦理入境手續，且照料入出境，一切進行頗爲順利，惟我代表團員始終未見到入境證。由於我方不同意持臺胞證入境，故中共乃改發「其他文件」，其間雖經我方不斷的交涉

磋商，但文件乃由亞銀總部保管、處理。

郭婉容謝森中之旅

我國當時由財政部長郭婉容率領代表團，前往參加亞銀北京年會，在兩岸不通航之立場下，我方不考慮以華航專機接送，而決定搭乘美國聯合航空公司班機經東京，再由東京轉搭日本航空公司班機前往北京。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因此次爲我政府代表團首次赴大陸參加國際會議，臺北新聞界視之爲熱門消息，故對於地主國旗

國歌問題、入境簽證問題、會場問題等等，尤其是有關代表團持何種文件入境，報界更是議論紛紛，揣測極多，有時稱是持臺胞證，有時則稱持中國通行證，或是境內旅行證，還有稱是以亞銀證明書入境，莫衷一是。我個人認爲，臺北的報紙每天一早即運抵香港，而香港新華社有大批人員專門從事分析、研究工作，對於臺灣各報五花八門的報導加以研判，其結果在一、二小時內即電傳到中共某一特定駐外使館，因此，每當我們接到最新指示，於上班時間前往亞銀交涉，該執行秘書代我方向大陸理事孔繁農轉達時，他似乎早已備妥切題的答案，不必再向上級請示。我們

只好嘆息「我們的底牌對方似乎早就知道了」。每次我與李光億組長進入亞銀總部時，總是躲躲藏藏的，以免應付守在門口從臺北趕來的記者追問交涉底細，以及發問敏感問題，或避免其錄影鏡頭對準我們，但卻所答非所問，異常困擾。

我曾於民國八十一年五月以顧問身分赴香港參加亞銀第二十五屆年會，時理事代表爲中央銀行總裁謝森中。此趟到香港開會並無入境簽證，或其他會場儀節等問題，較爲單純。當時只見到我國及少數香港記者追蹤謝森中總裁、邱正雄副總裁，以及我國代表團的其他人員。至於其他外國記者或非政府組織之觀察員們，則多是在追逐中共代表團理事代表人民銀行副總裁陳元，問題不斷，有如在訪問大牌明星，令人十分感慨，幸好會期只有三天。

當年與會的代表們都各說各話，而西方國家的代表則砲口一致，大多數在責備亞洲開發國家，指出自己富有卻不願幫助同一地區的低開發國家、不支持貧窮朋友——亞洲「洲胞」。東西間之對立十分明顯。迨會議結束，各自回國之後，大家也就忘了此事，等到下次會議將再重提一遍，每屆大概都是如此。（未完待續）